

附錄

《紀念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 年冥誕 學術研討會》紀錄*

本校（台灣大學）於民國 95 年 3 月 24 日（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校總區第 1 會議室舉辦「紀念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 歲冥誕學術討論會」，由李校長主持，邀請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黃俊傑教授演講〈傅斯年在臺大的辦學理念與策略〉，並發表由傅故校長所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之《臺灣大學的辦學理念與策略》一書，研討會上出席師生同仁討論熱烈。特將全文轉載如下：

主講人：黃俊傑教授

主持人：李嗣涇校長

回應：孫震前校長、陳維昭前校長

* 原刊於《臺大校訊》第 831 號（2006 年 4 月 19 日）及 832 號（2006 年 4 月 26 日）。承孫震、陳維昭兩位前校長與李嗣涇校長同意將他們對我演講的回應收錄於此，敬申謝意。

一、主持人李校長致詞：

孫前校長、陳前校長、黃主委、各位老師、各位貴賓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在我們臺灣大學第4任傅斯年校長第110週年的冥誕，來舉辦學術討論會，臺大校長至今是第10任，可是在所有臺大人的印像裡，一般覺得傅校長在大家的心目中留下了最顯明的印像，這當然跟我們有傅鐘、傅園有關係。今天我們已經進入21世紀，在傅校長去世近55年的時候，來舉辦學術討論會，我個人認為意義更加深遠。大家對傅校長記憶最深的，就是他在民國38年第4次的校慶大會上提出了「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這4項，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校訓。去年我接任校長之後，召集所有的行政主管在金山舉辦腦力激盪營，一起檢討如何恢復或強調大學的核心價值，經過兩天的討論，結果發現也就是我們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更顯示傅校長早在半個世紀前的遠見，他提出的校訓便是一個大學的核心價值。

我在此簡單介紹傅校長的生平，傅校長是山東聊城縣人，1896年出生，1916年20歲時進入北大文科，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候是北大學生代表之一，畢業後到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後來又到倫敦大學，他學的是實驗心理學、生理學兼至數學，1923年又轉到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1926年回國，那時中山大學剛成

立，他在該校擔任歷史系及國文系主任，後來又兼文學院院長；到了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是由他所成立同時兼任所長，那時才 32 歲，到了 1945 年抗戰勝利，他回到北京，擔任北大的代理校長，到了 1949 年 1 月 20 日到我們臺大擔任第 4 任校長，同年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臺大的任期只有 1 年 11 個月，於 1950 年去世。傅校長留給臺大豐厚的精神資產，如我們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以及對本校的學術自由、教育自主的理念，他在校慶時也曾提出哲學家史賓諾沙（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的話「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所以他留給我們很多寶貴的精神資產，歷久彌新、永垂不朽，很高興今天來開這個討論會，也祝福討論會成功，謝謝各位。

二、主講人黃俊傑教授演講：

李校長、孫前校長、陳前校長、各位貴賓先進、各位老師同學、大家早安。

在今天這樣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兩位前任校長回到母校，及本校師生共同來紀念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 年的冥誕，古人說「最難風雨故人來」，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感性的場合，承蒙李校長的好意，讓我

用 40 分鐘的時間來報告傅故校長在臺大的辦學理念與策略，我覺得非常光榮，今天的活動是在李校長就任第一年，而且是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剛剛起動之際，我們溫故而知新，回顧一下傅故校長的辦學理念，確實具有深刻的意義。正如李校長剛才開幕致詞所講的，傅孟真先生是 20 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人物，一生和中國的憂患和亂離相終始，他是孫前校長的同鄉，記得兩年前在傅故校長的老家山東聊城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傅故校長的行誼與思想。他是五四時代的北大學生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後來負笈英德兩國。抗戰勝利 1945 年的秋天，當時政府任命傅孟真先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是他一再謙辭並且推薦胡適（1891-1962）擔任北大校長，當時胡適滯美未歸，所以由傅先生來代理。他於 1949 年就任臺大第 4 任校長，1950 年 12 月 20 日在省參議會接受參議員諮詢時因腦溢血而逝世於會場。

傅孟真先生主持臺大的時候是一個歷史上風雨飄搖的時代，我在這裡引用他的話「我們現在在這個島上，正是檢討過去一切的時候」，那是一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歷史困局的時代。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裡面，傅斯年怎麼樣來辦理一個從日本殖民政府之下的台北帝國大學轉型為國立臺灣大學，他的理念及辦學策略以及他心目中大學的任務如何？他如何進行改革？他在臺大有何具體措施？以下是我今天報告的內容。

一、傅斯年的大學的理念

首先，向各位報告傅先生的大學的理念。在 1950 年 2 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一個禮拜所撰寫但尚未完稿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學校制度的批評〉，他在文中很明確的區分大學和專科學校的區別：大學必經預備學校，專科則不然；大學以每一種學科的基礎訓練（多為理論訓練）為主，專科則以每一種科目的應用為主；大學生在入學之始，至少在第一年級以後，即須能閱讀外國專門書報；專科學校用書應編譯；大學的實驗常是解決問題的實驗，較少練習手技，但在專科學校則一切實驗除了解原理的少數以外，以練習工作技巧為原則。

此外，他認為大學教育應特重以下四項要義：大學不可揉雜職業學校的目的；大學以學術為本位，專科學校以應用為本位；大學的教學必須與專科學校不同，專科學校不應模仿大學，而且大學的多數部門也不過是專科的程度，偏又不能作到專科學校的實踐性；大學畢業的任用資格除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之外，不應優於專科學校。傅斯年的大學理念接近於 20 世紀初期歐洲型的大學，以學術研究為主要目標，大學與就業導向的專科或職業學校，有其本質上的不同。

傅斯年指陳現代中國的大學之缺失說：「中國的大學，創設在清朝末季，當時管學大臣所『奏定』的『學

堂章程』，有『分科大學』一項，這裡面包括經、法、文、理、醫、工、農、商等科，這個制度可以說大體是抄自日本的，而日本的制度，又大體是抄歐洲大陸的，尤其是普魯士。北京大學，就是照這個章程辦的一個大學，也是當時僅有的一個國立大學，不過當時客觀的條件，並不具備，所以辦的不倫不類，這是清朝光緒末年的情形。到民國初年，美國影響來了，自南而北，即自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發動，教育制度從大學到小學，一齊受這影響，因而生了很大的變化。不過，原來的輪廓並未改變，只是德日的軀殼之內加上了一個美國的肉體，所以中國大學不能不說是中國的產物，非常特別，不過這個特別實在是一團亂糟糟而已。」傅斯年強調包括大學在內的中國各級學校制度，不應盲目抄襲外國學校之制度，應注意本國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

二、傅斯年的教育改革原則及其在臺大的作為

傅斯年在窘迫的歷史時空環境之中展現工作的狂熱情操。1949年國府退處臺灣，傅斯年在1950年說道：「我們現在在這個島上，正是檢討過去一切的時候，正是我們出問題給自己的時候。」

傅樂成（1922-1984）教授回憶傅斯年在臺大的情景說：「他對校務，幾乎是無事不做。校長辦公室的秘書那先生，住在我家中，時常被半夜裡叫起來處理校

務。這種辦法，平時即連家中人都不大贊成。他那種希望臺大趕快辦好的意念，竟使他坐臥不安。」

傅斯年強調教育改革的原則應在計畫教育與自由發展之間求其均衡：學校應循分層推進的道路求其多元化；同樣的學校不必只許有一個型態；都市和鄉村的學校不必用同樣的章程；異地的學校不必採取一致的辦法。傅斯年主張，辦教育應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求其平衡，並在傳統與改革之間求其平衡，傳統中國文明必須注意工業化、大眾化之現代要求。辦教育應在技能訓練與通才教育之間求其平衡，在教堂與市場之間求其均衡。

傅斯年在臺大推動臺灣大學的改革策略主要有以下幾項：

(1) 大學精神的重建：他致力於改造深具日本殖民工具性的臺北帝國大學為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臺灣大學，傅斯年說「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

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殖民當局於 1928 年 4 月創立，設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1936 年 1 月，增設醫學部。1937 年 4 月，原臺北醫院改制為臺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1939 年增設熱帶醫學研究所，1943 年 3 月，增設南方人文研究所與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臺北帝國大學之設立，原始目的係為配合日本帝國向南洋各地之侵略，作為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學術基地。籌設臺北帝國大學之中心人物，後來出任臺北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的幣原坦（1870-1953）曾強調臺灣是日本帝國前進南洋之據點，在人文及自然科學研究上，均具有重大價值。當時臺灣人在《臺灣民報》、《臺灣青年》等報刊，指責教育機會不均等，認為當時日本殖民當局在臺灣所執行的是「內地人本位教育」，不是「臺灣人本位教育」（《臺灣民報》，199 號，昭和 3 年 3 月 11 日，第 10 版）。《臺灣民報》批判臺北帝大 1928 年 4 月開學後，文政科學生 17 名，但臺灣人只有 3 名；理農科學生 37 名，臺灣人只有 3 人，全校職員 58 人的狀況。傅斯年針對臺北帝大之工具性角色而痛下針砭，呼籲大學應重其自主性，並提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與臺大師生共勉。這八個字後來成為臺大校訓，原文作「力學」二字，但現在臺大正式的校訓文字均作「勵學」。

我們先看看臺北帝大創立時（1928）1920 年代的臺灣與世界的歷史背景：

從臺灣來看，1920年代是台灣歷史轉型的一個關鍵年代。經過二十餘年的武裝抗日運動之後，台灣人從1920年代開始轉向議會鬥爭。1918年，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組成「六三撤廢期成同盟會」。1920年該會創辦《台灣青年》月刊，1922年易名為《台灣》。1922年再度易名為《台灣民報》（半月刊，後來改為旬刊）。1927年7月開始，《台灣民報》獲准在台灣發行。1921年11月，「台灣文化協會」創立，林獻堂（1881-1956）出任該會之總理。1923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經歷了創立，被日本殖民政府打壓、查禁，並再度建立的過程。1926年，「台灣文化協會」發生內部鬥爭，傾向社會主義的人士在新的文化協會中佔多數，積極動員群眾，發表政治演說，鼓動風潮，造成時勢。1930年10月，台灣發生霧社事件。

從世界局勢來看，20世紀的20年代，也是世界政治風雲變幻，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時代。在歐洲方面，莫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於1922年10月在義大利組成政府，11月獲得獨裁權力。1922年1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成立（USSR，簡稱「蘇聯」）成立。1923年11月，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在德國興起。1924年1月蘇聯領袖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逝世。1926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1879-1953）打倒托派。1929年10月，美國證券市場崩潰，從1930年開始歐美國

家發生經濟大恐慌。1920年代的西方世界獨裁體制逐漸興起，經濟趨於蕭條，確實是西方歷史動盪的十年。

再從東亞局勢來看，1920年代也是風雷激盪的歲月。從1919年五四運動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止，1920年代的中國是一段憂患的歲月。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上海。1922年4月發生一次直奉戰爭，軍閥混戰，民不聊生。1923年2月孫中山（1866-1925）在廣州就任大總統，組成第三次廣東政府。同年3月，中國要求日本廢除〈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悍然拒絕。5月至8月，中日之間因中國收回旅順事件發生衝突，中國各地掀起抵制日貨運動。同年12月，中國因為關稅問題而在全國各地掀起反帝國主義運動。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開始進行第一次國共合作。1925年3月12日，廣東大元帥府大元帥孫中山逝世於北京。1926年7月7日，蔣中正（1887-1975）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於上海。1928年5月，日本侵略山東濟南；6月，日本人暗殺張作霖（雨亭，1873-1928）。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入北京城，北伐成功，完成中國初步的統一。

臺北帝大創立於以上所說的歷史背景之中，在當時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下，扮演工具性角色。臺灣光復之初，原「臺北帝國大學」之名曾有人主張改為「國

立臺北大學」，民國 34 年（1945）年 11 月 10 日，教育部以高字第 57333 號公函，提請行政院院會討論將「臺北帝國大學」更名爲「國立臺北大學」，但經民國 34 年 11 月 20 日行政院第 721 次會議決議「通過，名稱應改爲國立臺灣大學」，行政院秘書處並於 34 年 11 月 24 日以公函復知教育部。民國 92 年教育部以臺高（二）字第 0910192456 號函行文臺大，檢附民國 34 年 12 月 15 日高字第 63242 號代電通知「臺北帝國大學經部提請行政院會議改爲國立臺灣大學已決議通過合電知照」之公文，可見 1945 年臺大係由「臺北帝國大學」直接更名爲「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大學」並未正式定名。傅斯年在臺大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大學的精神。

（2）通識教育的加強：傅斯年曾在校務會議有力地宣告：「我大膽向諸位先生提議，我們要在一年半之內，集中精力，改進本校各種通習科目，建設本校的教育制度，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於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學生的求知慾，是應該加以鼓勵的。」

(3) 堅守學術專業，提昇臺大的師資水準：1950年《新聞天地》105期〈週末隨筆〉就報導傅斯年先生在臺大兩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但遭遇到最嚴重的打擊、攻訐、阻撓，種種的困難也在此。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臺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鎗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恥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地絕不為所動，貫徹自己主張，且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這段報導很能說明傅斯年在臺大的改革成就。

(4) 推動自由選課制度，發展臺大各學院之特色：傅校長廢除臺北帝大時代之講座制度；落實歐洲大學教學自由的精神；主張讓臺大六個學院依其學術特性而各自發展。傅斯年要求各學院大一及大二修讀必修課程，文法學院三四年級則充分選修，理、農、工、醫等學院則參酌自由選課之精神排課，他認為學生若無選課之自由，就不成其為大學。

三、結論：臺大核心價值的再闡釋

綜合以上的報告，我們可以得到幾點結論。第一，傅斯年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近於歐洲的大學之典型，但是他的改革原則特別著重本國之具體社會文化脈絡，並強調專業訓練與通識教育的動態平衡。

第二，傅斯年在臺大所堅持的學術自主、學習自由、各院系發展特色等等理念，在臺大的發展過程中，都獲得不同程度的發揚。不但他與臺大師生共勉的「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成爲臺大的校訓，他所提出的「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之理想，更是成爲臺大人永恆的鄉愁！

最後，傅校長所奠定的臺大核心價值：「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值得我們再進一步闡釋。我覺得「敦品」和「勵學」屬於「己」的範圍（是私人領域的問題）、「愛國」和「愛人」屬於「群」的範圍（是公共領域的問題），傅斯年當年提出這八個字是以他個人生命的體驗和 1950 年臺灣特殊的時空情境而提出的，剛才李校長講去年臺大主管以兩天時間討論，將「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進一步詮釋，將「敦品」引申爲「誠信」、「正直」，將「勵學」引申爲「敬業」、「卓越」，將「愛國」引申爲「關懷」、「熱情」，將「愛人」引申爲「包容」、「樂群」。這樣的引申與發揮，除了「愛國」一點引申爲「關懷」、「熱情」我個人有一點保留之外，其餘我認爲都是很好的落實於此時此地的脈絡的辦學理念，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如果將傅斯年的脈絡與我們當前臺灣高等教育的脈絡，以及台灣社會的脈絡，進行一種所謂的「視域的融合」的話，就可以推出以下的闡釋：

敦品：建立頂天立地，自作主宰的精神。程滄波曾認為胡適是 "conservative liberal"，傅斯年是 "radical liberal"，傅斯年一生彰顯一種「自作主宰」的人格與風格。

勵學：致力於探索真理，創造新知。傅斯年強調：「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世界的文化」（〈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

愛國：弘揚中華文化，熱愛中華民國。民國 24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傅斯年鼓吹抗日，反對華北特殊化；民國 34 年秋，傅斯年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屏除偽北大教職員、檢舉漢奸；民國 36 年 2 月，傅斯年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都彰顯這種愛國情操。

愛人：「自己為眾人而生存」，民國 36 年 4 月，傅斯年為子仁軌題紀念冊有這一句話，台灣早期經濟發展的領導人物，如李國鼎、孫運璿先生等人的一生所體現的精神價值，豈不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說的「自己為眾人而生存」的精神價值嗎？

以上是我閱讀傅斯年的相關歷史文獻，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向各位老師和同學提出來的讀書心得報告，也許論點不是很成熟，等一下請兩位前任校長批評以及各位先進多多指教，我的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三、孫震前校長回應：

傅斯年校長 13 歲以前住山東聊城，他 5 歲進私塾，另一方面接受祖父親自教育，他祖父文武雙全、仗義好俠、行醫治病，是位學問廣博之士，傅斯年先生在 11 歲已將十三經唸完，在他小時受國學訓練，並不是給他很好的印象，甚至反抗中國傳統學問，至傅先生 50 多歲時，我覺得他年青之時所受之訓練對他往後有很大影響。

傅先生 13 歲至天津唸中學，三年後考進北大預科，他在數學、物理、化學、英文、國文的表現皆非常優異，在北大預科以第 1 名畢業進入北京大學國文系，他在北大之時非常有名，可能是與他小時所受訓練有重要之關係，在王汎森先生所寫之傅斯年傳中，提到北大當時有很多英才，傅先生是眾多英才中表現最優異之一位，有人說他是山東孔子後之第一人，也有人說他是黃河流域裡最有才華的年青人，在北大中文系畢業後，至英國留學修實驗心理學，一面修大學部之數學、物理、化學也涉獵很多文學著作，三年後轉德國柏林大學修 Einstein 相對論、語言及文字之考據，當時在柏林留學的中國學生後來很多在學術界中很有名，據趙元任夫人說當時有二位最用功的學生，一位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另一位即是學問廣博之傅斯年先生。

傅先生個性深受祖父、母親之影響，廉潔、正直、率真、剛正，是山東人之典型代表，在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先生聘他當北大校長，他委婉請辭，因深切瞭解自己個性不適合從事行政工作，只想作研究、唸書及寫文章，故推薦胡適之先生，當時胡先生在美國無法立即回國，由傅先生代理校長至第 2 年胡先生返國，在北大代理校長那段時間發生了重大爭執事件，因當時北大、清大、南開在後方形成西南聯大，傅校長將這些學生遷回北京後，北京尚有個偽北大，傅先生認為大學以上應表現出禮、義、廉、恥之精神，故堅拒偽北大之教師及職員進入北大，其實當時爭執是可以討論，是、非難以定論，因那些人不是自願留北京，而是當時政府無法保障他們，至於學生在經過一段時間之補習，以可以考慮讓他們有機會再進入北大，傅先生和他弟弟說祖父教導他忠、孝、節、義的思想，表現他後在來北大及臺大強調倫理教育的重要，另他在德國接受語言及文字的訓練也影響了他後來治學方向及重視史料學。

民國 41 年時我進入臺大，當時流行一句傅校長的話：「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是他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也就是他成立及帶領中研院史語所重建中國古代上古歷史之基本精神，他是位有創意、開創性之人物，在他重要的歷史著作〈夷夏東西說〉中，認為中國文化之來源不只是一個來源，是從好幾

個地方，夷是東夷、夏是中原，後來史料各種歷史事證證明，不僅是夷、夏還有其他地方，他對歷史的看法及對史料小心求證，是他對史語所最重要的見解。當初由於他的使命感代理北大校長及當臺大校長，當時的臺大百廢待興，在安頓好學生生活後，即成立了「清寒獎學金」，學生申請獎學金之時要求學生誠實，學校信任，是培養學生誠信觀念、人格的陶冶的一種方法，同時對大一學生之通識教育非常重視，他在年青時雖有一段時期認為中國學問對國計民生一無用處，但在臺大他主張大一應教孟子和史記，他一生不願作官且沒階級觀念，他辦大學的二個理念，如黃教授所言我完全同意：(1)、大學是追求知識的地方，知識學問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另學術研究求真，追求真理然後才產生西方的科學，相對目前教育體系，把教育知識化，而知識工具化，我想傅校長之辦學理念認為大學是追求知識、求真的。(2)、人格培養，故其在北大之時主張禮、義、廉、恥，要求老師要作為學生表率，我本人是較能體量他當時的作法，因他的性格是如此，「敦品勵學」是在台灣大學第4屆校慶時他提出之主張，至傅校長去世時由中文系、哲學系及心理系老師建議成為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各位是否覺得有點類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覺得他對大學生之人格培養、倫理之重視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他小學是受傳統教育，大學以後接受西方教育，

回到中國至 50 多歲到臺灣大學後又主張學生修孟子及史記，又回到他之前所反對的部份，中國傳統教育以倫理為主，不是以知識為主，而知識也不要工具化。

四、陳維昭前校長回應：

今天我們在此舉行「紀念傅故校長孟真先生 110 年冥誕學術討論會」，聆聽了黃俊傑教授有關〈傅斯年在臺大的辦學理念與策略〉的精闢闡述，更加令我們緬懷傅故校長的德澤以及他為本校留下來的珍貴精神遺產。傅故校長領導臺大只有短短的一年十一個月，但卻為臺大留下了豐沛的遺產，形塑了近六十年的臺大精神。

十年前在一場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所舉辦的通識教育講座中，本人曾以〈邁向 21 世紀的臺灣大學：回顧與展望〉為題，與學校師生共勉並一起思考臺灣大學的未來發展，談到傅斯年傳統與臺大精神，對我個人最有啟發性者有三點：

第一、傅故校長提出鮮明的大學理念：在傅校長的大學理念中，比較重要的有幾點：其一、大學是一個學術單位，應以學術為本位，以學術研究為其主要任務。大學教育旨在對學生進行學術訓練，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因此大學應不同於職業教育，大學應與

專科學校有所區隔。其二、大學必須教學、研究並重：傅故校長認為大學的研究所決不能等同於大學之外的研究院。研究所的教授要承擔教學任務、把訓練與教育學生做為重要的職責。其三、大學必須有良好的學風：傅故校長所謂良好的學風包括四個內容（一）自由的思想（二）規律的生活（三）求學的志願（四）師生間的友愛，乃至愛校、愛國、愛人民的情操。這也正是臺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核心價值。

第二、傅故校長辦學行事堅定捍衛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傅故校長可以說是這一代教育獨立思想的主將，除了主張「大學不能置之一般教育系統中，而應有其獨立的意義」，更大聲疾呼：「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傅故校長就任臺大校長後，極力將其教育獨立的思想，付諸實踐。他大力整頓師資，解聘許多專兼任教授，得罪不少官場人物，他不但不畏壓力，更在報紙發表文章公開說明、堅持理想。他辦理新生入學考試絕對避免人情關說；更拒絕白色恐怖，堅持非經校長核准，軍警不得隨便入校捕人，1950年（新聞天地）第105期評論說：「傅斯年先生掌臺大兩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

第三、傅故校長主張辦學應注意均衡原則與本土

取向：關於均衡原則他主張辦教育應該要在「計畫教育與自由發展」、「理想與現實」、「傳統與改革」、「技能與通材」以及「教堂與商場」之間取得平衡。關於本土取向，傅故校長說：「我以為學外國是要選擇著學的，看看我們的背景，看看他們的背景。……既如學校制度上學外國，要考察一下他們，檢討一下自己」，避免「一學國外，便先學其短處」。傅故校長所提示的均衡原則及本土取向，在今日仍有其價值。

記得在十三年前，我曾提出一篇〈我的服務計畫〉，表達我個人的一些理念，我當時曾說：「臺大不是牛津，也不須做哈佛、柏克萊，她要做的是臺灣的臺大、國內學術的標竿」。臺大之所以為臺大，有她自己擁有的獨特性：第一、臺大是國內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科系最完整的大學，是國內培育知識份子的最大人才庫，在過去四分之三世紀以來，它一直和臺灣的發展息息相關，是引領臺灣認識本土、放眼世界的燈塔，也是臺灣與世界接軌互動的重要窗口，第二、臺大擁有特殊的文化，這種臺大文化乃是以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為其核心價值，也正是傅故校長斯年先生所留下來的精神遺產。以上兩種實際的建制與精神遺產，構成臺大的獨特面貌，蘊育了臺大人的特質。1996年5月本人於校務會議，提出了「純淨、自主、均衡、卓越」四大信念，個人認為唯有透過校園文化與學術倫理的重建以及絕對價值之肯定，大學的真正自主與

自由才能健全發展、屹立不搖，唯有提昇研究水準、改善教學環境、發揚大學之世界精神，才能立足本土、走向國際，唯有強化大學之推廣與服務功能，才能發揮大學的力量，把大學內真正的自主、自由、純淨帶入社會各階層，促進社會整體的進步。一個理想的大學必須在教育與研究間、專業與通識間、科學與人文間、內在與外在間、本土與國際間，取得均衡，必須在學術純淨與自主的基礎上，力爭上游、追求卓越。

1999年5月個人進一步指出「從完整走向精緻、從臺灣走向世界」是臺大邁向世界頂尖必走的一條路。臺大在追求知識、學術領域的完整之外，更須力求內在的精緻。「完整」可以使臺大教育更具「通識」的功能；「精緻」可讓我們的教育更具「卓越」的品質。而所謂「從臺灣走向世界」則有兩層意涵：其一是臺灣大學不只是臺灣第一學府，也要是世界一流學府，其二是臺灣大學的學術研究不只要融入世界的潮流，更要能凸顯本土的特質。個人提出上述主張與同仁共勉，其目的無非是一方面要維護傅斯年傳統與其所建立的臺大精神，另一方面更要能將此優良傳統與精神予以發揚光大。

在民國八十二年，個人曾提出下列七個理念作為努力的方向：一、維護臺大校園自由風氣；二、建立學術自信、提高學術地位；三、改善教育體質、提昇

教育品質；四、規劃校園整體發展方案；五、積極爭取經費並合理分配；六、改善組織架構、提高效能；七、建立臺大人的共同精神圈。

校務發展是持續性的工作，傅故校長不僅為臺灣大學留下豐富的精神遺產，也建立許多重要的典章制度，籌集資金，進行基本建設，延聘一流教師，為臺灣大學建立可長可久的厚實基礎。以下是近年來臺大師生同仁為實踐傅斯年傳統與臺大精神的工作策略：

一、重建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是校園中成員共享信仰、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的綜合，經過長時間粹煉與世代傳承逐漸形成。具體的做法則是：

（一）加強通識教育、回歸通材教育理念：成立「共同教育委員會」積極改革通識教育課程，期能就本校通識教育發生具體性及結構性的改革。

（二）辦理「勞動課程」、落實服務精神：以培養學生負責、自律、勤勞、服務與互助合作的美德。

（三）創辦臺大藝術季、杜鵑花節、醉月湖音樂會等，營造校園藝文氣息，落實結合社區、關懷社會之理念。

（四）頒行「臺大教師倫理守則」，凝聚教師共識建立共同的道德規範，發揚學術倫理，落實自主、自律的校園文化。

二、維護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本校在新大學法授予大學享有自治權前，即首開各系所推舉系所主任、院長、校長之先例，並竭盡心力維護大學的人事、財務、課程自主權。軍訓選修、共同課程由校自訂之實踐，為大學自主邁出重要的一大步。

1993年10月成立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1995年6月校務會議對調查報告達成原則性處理共識，並完成十項精神性宣示，呼籲任何政治力量均不應介入大學。「哲學系事件」調查告一段落後旋即成立本校「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於1997年6月提出總結報告，並供校史參考。凡此均展現臺大人追求真理、崇尚自主、堅拒外力介入的傳統精神。

三、提昇研究水準、提高學術地位：臺大各項學術成果指標，不論是教育部國家講座、學術獎，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傑出獎等獎項的獲獎人數，所發表國際期刊論文，研究計畫，或專利、技術移轉等，均居國內大學之冠，但同仁仍精益求精，邁向世界一流，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包括：（一）辦理研究單位評鑑及教師評估（二）整合研究、重點發展（三）延攬優秀人才、激勵教師研究。期能加速本校學術發展，早日躋身世界頂尖大學之林。

四、改善教育體質、提昇教育品質：本校近年從豐富教學內涵、實施教學評鑑及獎勵兩大方向，積極

謀求教學品質之改善。豐富教學內涵的措施有：(一) 加強基礎核心課程 (二) 廣設跨領域學程 (三) 推動非同步網路及遠距教學。教學評鑑及獎勵方面，辦理課程評鑑，並對教學表現優良之教師透過「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予以獎勵及表揚。

五、規劃校務長期發展方案：1995 年完成首部「臺大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並據此規劃每五年一期的「中期校務發展計畫書」作為校務規劃之依據，由於近年學生人數逐年增加，系所組織不斷擴增，校區空間頗見窘迫，因此一方面積極收回外借校產並對校產做有效運用，一方面增建校舍，推動校園環境規劃，並籌設新校區多管齊下，以拓展教學、研究及學生活動空間。

六、加強國際交流、擴大校友聯絡：致力拓展與國際知名學府之合作關係，透過學生與教師交換、研究計畫合作、雙學位制以及國際學術組織之參與等，讓世界知名大學之師生走入臺大，也讓臺大師生走向世界。目前臺大已與世界 180 餘大學建立學術合作關係，每年交換教師及學生人數迭有成長。為配合此一發展趨勢，一方面透過「進階英語課程實施辦法」加強學生英語能力，一方面增加英語授課課程，設置獎學金，以吸引更多優秀的國際人才。擴大校友聯絡方面：成立「校友聯絡室」，負責校友聯絡工作；發行校

友雙月刊做爲校友與母校、校友與校友之間交流的園地；與校友們合作成立校友總會及國內外各地區之分會，以建立臺大人的共同精神圈。

七、擴大社會服務：本校除了探究真理、追求卓越外，並積極回應社會之期待，擴大推廣及服務工作。具體作法爲（一）藉由建立產學合作聯盟，協助教師技術轉移，成立育成中心，推動學界科專計畫等，將研究成果貢獻於企業之發展與經濟之成長。（二）擴大辦理在職進修班、遠距教學、網路教學，以增進各產業從業人員專業技術素養，提供社會大眾更多終身學習之機會。（三）善用附設機構之資源，協助發展社區醫療，提振地方產業。

結語

臺灣大學自民國 34 年迄今，已歷經六十餘載，這期間傅故校長斯年先生當年所揭櫫的「學術本位」、「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均衡發展」之大纛早已成爲臺大的精神，塑成臺大的風貌。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緬懷傅故校長的德澤，並思考臺灣大學未來的發展，必須一方面堅持傅故校長傳承的大學理念，發揚臺大的優良傳統，一方面審視當前國家、社會的環境，以前瞻的視野與寬廣的胸懷全心充實臺大的面貌，再創臺大教育與學術的高峰，讓臺大不僅是國人的驕傲，更是世人所推崇的學術殿堂，並爲人類、

社會做出偉大的貢獻，如此方能不辜負傅故校長所建立的傳統與精神。

五、綜合討論

李嗣涇校長：綜合討論的進行方式，就是請各位聽講人針對黃教授的演說及兩位校長孫校長及陳校長的一些回應，提出各位的觀點及看法。我們會請主講人來回應。我先起個頭，剛剛對於黃教授特別引到胡適之先生所說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認為它是一個大學的典型。裡面比較沒有壓力，不用計算 SCI 和 SSCI。我個人有一個看法，我記得 R. Feynman，被譽為美國最聰明的物理學家，他就認為美國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設立是一個錯誤。認為它缺少學生的挑戰，缺少壓力。很多創新的事物是從挑戰中才能產生。其實我們去觀察它的 Record 也可以看得出來，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基本上請的人都是得過諾貝爾獎或是做過很大的貢獻的人，像愛因斯坦他已經將他的狹義相對論及廣義相對論導出來，受到世界肯定並邀請他來。但是很不幸的，得過諾貝爾獎大部分的人，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一生就只得過一次諾貝爾獎。諾貝爾物理獎得過兩次的人只有一個人，就是 John Bardeen。他因為發明 transistor 和超導體理論，得了兩次諾貝爾物理獎，其他則沒有。化學比較

多，大概有三位四位是得過兩次諾貝爾物理獎。這代表的意義就是，當你得到諾貝爾物理獎後，你今生的貢獻大概都不會比這個還大。所以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邀請去的人，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貢獻。所以這麼多年來，它的成就並不是很好。楊振寧第二個重大貢獻，所謂 Yang-Mills theory 是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產生的，但是這樣的人非常少。所以我自己並不認同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這種作法。它不見的是一種最好的模式，還是需要學生的挑戰和壓力，才能產生較好的成果。

陳教授：李校長、孫前校長、陳前校長、包副校長及各位先進。剛剛聽黃教授的演講，覺得獲益很多。雖然今天來聽演講的人不多，但是我建議還是將演講內容登在《臺大校訊》，這樣能讓我們年輕的教師及在學的學生，對我們傅校長真正知識份子的風骨，能有深切的了解。傅校長常被稱為臺大的守護神，這核心的問題是他對學生非常的重視。傅校長說，他徵求學生對校務或選課的意見以後，他整整一個禮拜每天都看意見看到半夜兩三點。很多好的意見都採納，並給學生獎勵。另外，書卷獎的開始也是傅校長的創建。其它臺大各個可長可久的制度與典章，都是在傅校長任內完成。在民國三十八年三十九年風雨飄搖的年代，情治機構往往會給同學帶來壓力。那時傅校長在報紙公開發表大學不再扮警察的業務。在那個時代，

那種政治環境下，傅校長當時的舉動充分代表他對學生的愛護。我們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適用於全校的教職員工生。現在臺大拿到五年五百億，並在邁向世界百大的過程打拼。我個人認為這只是一個過程，邁入世界百大算是攻頂，但是攻頂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最後的目標就是要奪標，奪標的意思就是每個臺大人都能夠實踐傅校長所提出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林教授：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是非常奇特的個案，它強調理性與思維，但是卻缺乏實驗或與經驗世界的互動。這是一個特殊的典範，但是臺大將來希望能邁入世界頂尖大學之列，所以各種典範都需要參考。我們在推動一流大學時，有因應的客觀指標固然重要，但是有些重要的東西絕對不是光靠數量就能決定。

王教授：我剛進來臺大的時候，曾讀過一份記錄，其中記載傅斯年校長強調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有十分證據，最好也只講九分話。另外傅校長不願窮的學生繳不起學費而失學。所以我們流亡學生都得到免學費的優待。還有窮的學生若因太窮繳不起醫藥費，還可申請免費的「傅斯年紀念病床」。

徐老師：大學不應該盲目抄襲國外制度。我們大量採用國外的評估制度之下，是否該想想我們還有什

麼地方跟他們不一樣，我們要堅持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李嗣涔校長：其實我們臺大有很多作為都是獨創於校園的。譬如說，拿博士之前要記點數。在國外也很少計算 SCI 和 SSCI，這並不是抄襲國外制度，而是從本土衍生出來的。

陳教授：我個人認為，SCI 評量只是階段性的任務。等到大家都用功了，就不需用 SCI 了。等到研究做的很好，SCI 就不用算的那麼緊。

李嗣涔校長：我也認同陳教授的說法，SCI 評量只是階段性的任務。就像當初拿博士前要記點數的政策也被大家反對，但是到了今日大家對這個制度好像已經習慣。應該說這已是一種氛圍，而大家自然會超過該有的點數。

陳教授：黃教授的演講中，有一部分非常重要就是教育理念跟時代互動的關係。傅斯年先生當時對德國的教育非常推崇，他是期待臺大未來能朝德國的大學體制去建設。但是戰後德國大學的發展開始相當程度採用美國，但這兩種大學體制的互動關係，特別追溯到時代背景或整個哲學思想背景或教育理念背景，可否請黃教授下點註解？

黃教授：對於剛才各位先進的意見，我有以下幾點的回應。第一點，李校長認為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缺乏學生的挑戰，因此它是不完備的。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一個完整的大學應該是師生學術志業共同體。第二點回應，陳教授剛剛提到傅斯年在臺大時非常重視學生，對抗情治單位，這一點是非常正確。第三點，還是回應到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本校剛剛創立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現在臺灣社會壟罩一種拼經濟、拼選票的氣氛，而這氣氛彷彿也影響到研究領域。所以從某種觀點來看，獲得較多經費的研究型的大學，一方面是受益者，一方面也是受害者，而人文社會科學更是深受量化思維的傷害。如果有一天臺灣能從臺灣式的「拼業績」的思維走出來，也許我們在學問上會比較好一點。第四點回應，對於徐教授所提全球化時代與高等教育的問題，我個人將在五月的時候有一場演講，針對全球化趨勢對華人地區高等教育的衝擊與影響有所討論。

孫前校長：傅斯年校長具有時代的意義，而也是臺灣唯一具有代表性的校長。傅斯年幾乎是和胡適之有同樣的地位，他不要做官，但他人有受人尊敬的位置。就是因為前人所留下來的風骨，讓我們後人有效法的機會。

陳前校長：傅斯年校長之所以受到我們這樣的尊敬，是跟他的個性和時代背景有關。就如剛剛孫校長提到，傅校長很有力量。記載中，傅校長還可以在蔣

中正先生前面翹著二郎腿，不用站起來。然而重要的，還是整個社會環境對學術還是非常尊重。但是現在的社會就不一樣了，將來李校長可能會面臨到，當在堅持一些理想時，大家就會用意識形態把你的意義淡化或扭曲，這是我們的悲哀。但是這是身為臺大校長的宿命，不管環境怎麼變，我們就是要堅持道理、堅持我們的獨立和堅持我們的自由。

李校長：我們的時間剛好也已經到了。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主講人和各位的參與。今天傅校長的一百週年冥誕學術研討會就在這邊結束。